

语言与文化同构及语言价值涵义空间的形成

王兰霞

(首都师范大学 北京 100083)

提 要: 语言是一个开放的自组织系统,语言文化学研究的新趋势是运用同构的方法分析语言。同构的语言思维模式使得语言文化现象的静态研究转向进化的动态过程研究。本文尝试运用同构中的耗散、分支、吸引等理论,分析语言文化单位涵义的构成,揭示涵义空间自组织的形成及进化机制。

关键词: 语言文化同构;价值涵义空间;分支;吸引;耗散

中图分类号: H0-0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0100(2014)06-0011-6

The Synergy of Language and Culture and The Formation of Language Value Meaning Space

Wang Lan-xia

(Capital Normal University, Beijing 100083, China)

The new trend in the development of linguistic culturology is to begin the language analysis with synergy method. The synergy mode of language thinking shifts the scholars' focus on linguistic culturology studies from stable and stationary states of language to dynamic process of its evolution. This paper attempts to use dissipation, branch, attract and other principles of synergy theory to explore the concept construction of linguistic culture. Through synergy analysis of different texts, it further reveals the self-organizing evolution mechanisms of meaning space, as well as the construction mechanisms of language value meaning space.

Key words: Linguistic Culturology; Synergy; Branch; Dissipation; Value Meaning Space

1 引言

语言文化学的综合性决定其研究角度的多维性。随着研究视角的不断拓展,语言文化学的新趋势是尝试用同构的方法对语言进行分析。作为研究不同属性的复杂系统及其自我组织过程的方法论,同构研究方法广泛运用于各个领域的学科知识。语言是一个复杂的、动态的自我组织系统,其内部的涵义空间是语言文化学研究的对象。同构研究方法有助于揭示具有价值认知特点的语言文化学系统,探索其进化过程和自组织的共相机制。

同构(协同)(синергетика)源自希腊语 synergia,意为合作、协作。同构理论是1974年由哈肯(G. Хакен)提出,它源于现代物理学和非平衡统计物理学,是一门研究完全不同学科中存在的共同本质特征的交叉科学,通过分类、类比描述各种系统和运动现象中从无序到有序转变的共同规律。同构是很多的分体系共同作用的行为,其结果是在宏观层面产生相应的功能和结构(Хакен 1980: 16)。因此,同构理论也可称为非平衡系统的自组织理论。

弗洛连斯基(П. А. Флоренский)也曾提到过现代同

构学思想,认为“存在的联系……就是一种同构,是存在的共同活动,它与任何一种存在都不是等价的平衡关系,与任何一种存在都是一种新的关系,同构即是共同活动的作用之一”(Флоренский 1990: 286)。在思考语言属性的时候,弗洛连斯基得出结论“词就是同构的”。词比其自身包含的内容多得多,既是认知主体也是认知客体,是世界中新的现实(Флоренский 1990: 263-292)。

同构就是在人与自然之间构建一座创造性的桥梁。语言与文化的同构不同于自然环境的同构,前者是一种二阶同构,是一种对人的感知、记忆、决定以及创造性思维过程的语言文化学意义上的非线性阐释。对于语言文化学来说,其实质是蕴涵在第一形象基础上的思维结构。因此,从广义来说,语言就是复杂的、非线性的、开放的、自组织的自然系统模式,是同构的对象。

2 语言与文化的同构机制

2.1 语言子系统的非线性进化

同构是很多的分体系共同作用的行为。作为跨学科

的知识,同构研究的是动态、开放、非线性的自组织系统。非线性(нелинейность)的最大特点是对象之间的相互作用不是简单的数量叠加,而是相互制约、相互耦合,从而形成一种完全不同于各部分的崭新整体。

系统的开放性是与周围环境进行能量、物质和信息交换的能力。能量及信息的交换是一个鲜活系统的重要特征(Герман, Пищальникова 1999: 23)。有关系统的开放性,邦达尔科也曾有过精辟论述:环境概念对于我们描述和解释语言分体系有着实质性的意义……语言中的任何一个分系统都不能仅在系统内部分析,必须分析系统与外界之间的关系才能获得最有分量的解释力(Бондарко 1985: 194 - 195)。自组织(самоорганизация)的最大特点在于个别的、单个的成分以协作方式,通过组合进行同构。在自然界中我们常常看到自组织的现象,如成群的鱼类、结伴迁徙的鸟群等等。

在语言人类中心论占主导地位的当下,开放系统的语言自组织原则并非凭空想象。理论语言学的奠基人洪堡特指出,语言的实质是一种开放的子系统的自组织和延展过程(Алефиренко 2008: 189)。可以认为,语言内部形式的同构实质是一个整体的自然符号模式,是认知主体与现实之间民族文化的媒介,人们通过该媒介得以认知世界及世界中的自身。这种模式的实质就是在最初形象基础上形成的思维,是民族文化个性意识的形成。语言的内部形式就是隐藏在潜意识中的一种同构过程,语言符号的框架就是语言内部形式表达的手段,是一系列形象的涵义的积累。

同构是研究复杂系统自组织和进化的某种朴素规律,进化是混沌的交际情景中即发的系统结构,同构理论使得我们将这一混沌的进理解解为创造性原则。同构的情景也如同一种进化的游戏:除了总体游戏规则,其他都是不确定的,因此复杂的非线性的动态子系统也是不确定的,具有很大的偶然性与必然性。一个系统的发展不仅取决于实际状态,即必然性,还取决于对未来的预测,即偶然性,二者的统一就是目的性。语言建立在人的心理活动及精神活动之上,同时语言也运用了物质性发音器官的声音,通过约定俗成建立了规则,而规则最初正是随机性的表示,这种随机性始终伴随着人为的选择,也就是说语言系统就是一个随机性与无意识选择的积累,一旦这种选择得以成为一个语言系统,那么该系统内部的运行就有了必然性。同构中实现非线性进化的基本机制就是分支机制。

2.2 分支的过程

分支(бифуркация)又称为分叉点,是实现系统非线性进化的基本机制。分支起初的意义是指产生了新质量的数学形象,是在不平衡系统状态和动态的轨道上出现的分流以及数量不定的分叉。分支会产生一种质量上的

突变,是一种自组织过程。在语言的非线性系统中,分支不仅与外部环境变化有关,同时也与系统自组织发展中的一些即兴过程有关。

语言是一种自组织体系,言语活动就是一个同构系统,在自组织的过程中会产生各种分支,语言的进化是与作为交际系统语言中的分支和耗散相符的。交际的实现本身也是一种自组织的过程,是语言过渡到言语过程的不平衡状态趋向稳定的可能性,而分支也正是语言文化现象进化的可能路径。分支最终组成新的、完整的和有文化标记的符号。在分析成语间接派生称名的过程中,我们尝试着归纳以下两种分支情况:

(1) 对于认知称名客体的特征,观念结构的联想选择是客体知识观念化的重要言语思维活动。例如,залезать в карман = незаконно пользоваться чужим добром, класть себе в карман = присваивать чужие деньги, наживаться。可以将这两个成语看成两个分支。分析这些成语的内部形式,得出结论:在“丰富、充实”这一观念化知识过程中,在文化符号产生的那一刻,要认知如 афера, присвоение, нажива 等这些特点,就要求不同的分支恰当选择才能保证交际过程中个性涵义的完整表达:1) 表示非法盈利(афера),人们选择(залезать в карман);2) 强调侵占别人财产(присвоение),人们选择(класть себе в карман);3) 表示突然间发横财(нажива),人们则选择(набивать карман)。

对于认知称名客体的特点而言,观念结构的联想选择是重要的言语思维活动,这也就是为什么存在相近的客体或客体特征的文化标记符号,同时还存在不同的形象基础。比如成语 болван неотёсанный, дубина стоеросовая, мурка с глазами 等。болван, дубина, чурка 都是木头,形象基础既相同又不同,但都用来表示愚钝的人。这里的分支实际是一系列涵义的集合,是涵义分支,在认知客体的最初阶段,观念结构的联想选择可以帮助人们在不同的情景中寻找合适的认知文化客体。

(2) 在文化符号产生时,词汇单位分支是涵义构成中最重要的步骤。选择所需的词汇单位对于语言文化符号的构成而言,无疑是必要的涵义供体(донор)。文化符号词汇成分有一系列变体,各变体有其适用的文化语用情景。比如,俄语表示“贫穷”(бедность)有如下分支:перебиваться с хлеба на квас, с куска на кусок, с корочки на корочку, с гроша на копейку 等。上述这几个词汇单位在表达同一观念结构“贫穷”时,语言意识会根据不同的涵义倾向选择不同分支:перебиваться с хлеба на квас 表示很清贫,但是有面包和格瓦斯,粗茶淡饭而已;с куска на кусок 意思是只剩下一片片的面包,с корочки на корочку 表示处于饥饿状态;而 с гроша на копейку 则表示穷得叮当响,身无分文。

在交际涵义生成过程中,分支的选择具有不可预测性,它取决于文本特点及说话人意图,但却是涵义生成的重要步骤,是语言进化的机制,在一定程度上也具有独一无二的特性。由于存在分支和吸引现象,间接派生称名的涵义生成都呈现出不可逆的过程。

2.3 创造性吸引

分析一些具有文化标记的语言符号表明,分支不是系统或是结构发展趋向的偶然选择,而是使其摆脱不稳定状态,接近平衡点的一种选择,也是接近创造性吸引的一种选择(Герман, Пищальникова 1999: 55)。创造性吸引(креативный аттрактор)是文本和语言同构理论中的一个概念,以主导含义(доминантный смысл)的说法被引入同构理论,之后在语言学领域获得了进一步发展。

吸引子(аттрактор)是非线性物理学、数学中的术语,用来描述系统的复杂自组织行为。吸引子是指系统的一种稳定结构,能够将一些不同条件的体系轨道吸引到自己内部来,形成一个相对稳定的区域(吸引区、吸引域)。分支过程就是从在一个系统过渡到另一个系统,是从一个吸引转到另一个吸引。正是吸引子确定了系统的动态,表现出一种进化过程,所有系统中的成分都趋向同化和类似的相互作用。

作为自组织系统的语言,其吸引不仅仅与语言系统自身的条件、功能有关,这种吸引子的产生还与语言单位的周围环境密切相关,表现为系统与环境相互作用的同构吸引。如成语 *лепта вдовицы*, *лепта* (雷普塔金币) 和 *вдовица* (寡妇) 可以看成位相空间完全不相干的点,但由于鲜活的圣经故事这一特殊文化背景(语言系统与环境的作用),二者同构为一种吸引,表示微薄的贡献。在语言系统的某个子系统内,“吸引子”就构成一个微观场,在词汇子系统内的吸引区或吸引域就会产生语义场。

创造性吸引更接近于个性涵义(Герман, Пищальникова 1999: 55),可以帮助人们正确理解一定文本环境中的主要意图,其形式可以是一些特殊的结构对称的语言符号,如 *белая ворона*, *тёмная лошадка*, *живой труп* 等。这种特殊的对称结构在同构理论中被称为混沌状态(хаос),混沌进化被理解为创造性原则,更接近于个性化涵义。这些个性化涵义是在多理据、多情态的言语活动过程中产生的,其动机可以看成涵义进化的目的,可以呈现出混沌的状态,通过吸引趋向稳定的涵义。

从认知文本的意图和交际语用来看,上述几个例子所表示的创造性吸引都是文化符号构成的最终结果。正是处于创造性吸引的行为域中,文化派生符号的涵义成分获得该语言文化必要的认知结构。在我们所举的例子中,正是由于这种吸引的存在,客观外部世界中并不存在的白乌鸦或活尸等却获得主观内部世界及语言中间世界的表达。在整个文本的交际语言背景下,其自身的意义

耗散转而成为特殊的一类人,这就是个性涵义,即文本中的主导涵义。吸引是时空中的现实结构,是在开放的非线性环境中的一种自组织过程。吸引结构就是为了进化,系统内各成分的进化都趋向吸引,也即交际过程中涵义同构的自组织过程。

2.4 耗散结构的自构

本文将开放的、非线性的系统称为耗散,是同构理论的研究对象,而世界上活动的有机体就是这种开放性、非线性典型的代表。由于这些有机体不断与外部环境中事物进行能量交换,生态界的动态平衡才得到保障。

耗散(диссипация)这一术语源自英语词 *dissipate* (即 *рассеивать*) 消散、散开,指系统内部的等级耗散了物质、信息和能量。系统的开放性是保证物质、能量交换和相互作用的条件,物质交换才是活的系统的重要品质。耗散结构理论(диссипативность)是一种新的关于非平衡系统自组织的理论,可概括为:一个远离平衡态的非线性的开放系统(无论是物理的、化学的、生物的还是社会的、经济的系统)通过不断地与外界交换物质和能量,在系统内部某个参量的变化达到一定阈值时,通过涨落,系统可能发生突变(非平衡相变),由原来的混沌无序状态转变为一种在时空或功能上的有序状态。这种由远离平衡的非线性开放系统形成新的、稳定的、宏观的有序结构,由于需要不断与外界交换物质和能量才能维持,因此称为“耗散结构”(dissipative structure)。

语言和言语中的意义(значение)和涵义(смысл)关系问题就是一个耗散过程。近些年,随着跨学科理论的迅速发展,耗散理论广泛受到语言学界的关注,跨学科语言应用的例子也比比皆是。我们经常会听到身边的人说,知识不够用了,要“充充电”;某人的大脑不够使或是做了蠢事,会被称为头脑“短路”等等。这里的“充电”、“短路”已经不是物理学上的概念,是典型的语言耗散现象。正是在开放的、非平衡系统的积极作用下,耗散结构成为语言文化的一种特殊的动态形式,涵盖复杂的、开放的、不稳定的、非线性体系自组织的动态过程,通过进化了的内部形式相互作用,即兴产生在分支的过程中创造具有语言文化特点的新结构。

由于语言文化的多相性,这种局部系统分支转换到一个新的质量中时避免了重回原状的可能性。这个过程是不可逆转的,而这一不可逆转的过程又产生物质的新动态形式。如 *яблоко раздора* 中的 *яблоко* 指“苹果”,没有民族文化成分,而成语 *яблоко раздора* 则为“纷争的起源,不合之因”。语言的开放性使“苹果”一词与圣经故事同构,在进行物质、信息和能量的交换互动过程中,“苹果”“果实”的涵义耗去,散去,同时吸收新的外部信息,语言内部的非线性机制使得不相干的两个对象相互制约耦合,进入新的有序状态,形成整体上完全不同于各部分的

崭新涵义与 раздор 叠加后,具有新的文化标记意义,而新的文化标记涵义与苹果已经没有任何关系,逆转不再可能。

3 语言价值涵义空间感知的同构过程

语言与文化的同构空间由大量和多样的内部动态成分和联系组成,其语义空间如同一个承载人类全部活动的网络系统,确保作为社会文化现象的人类的统一活动。在语言的整个语义网络中,每一个要素在同构过程中都能够彼此联系,人与语义网络内部各成分的相互作用经过短时记忆的滤化,成为长久记忆,保障语言与文化的价值涵义空间的统一性和完整性。语言的价值涵义空间是借助某一语言不同的符号代码被感知和接受的,一定语言的符号域创造与其相适应的价值涵义结构,在人类掌握交际原则和规则的过程中,在感知和使用表达民族文化涵义的语言符号的过程中形成价值涵义空间。

3.1 文化观念与符号的同构

认知符号学理论的成就之一,就是在研究超语言因素对形成词汇语义结构的影响过程中消除结构的局限。人类心理的文化历史起源于周围环境,因此认知过程是在语言与文化环境的彼此作用下不断形成的。作为人类心理的派生现象,文化符号是社会个性结构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内部的社会价值涵义关系即是民族文化的实质。

语言系统组织网络包含语言、非语言及智能的各种因素的相互作用,该网络原则是整体语言词汇组织以及语言个性词汇的基础。卡拉乌洛夫把词汇学归结为语言个性结构的联想语义层面,这个层面在很大程度上是词汇化语法的联想语义网络(Караулов 1987: 87)。通过联想语义网络对词汇文本进行功能性分析是具有前瞻性的研究方法,文本中的每一个词不仅以语言符号的形式存在,而且是承载一定信息的代码,并作为词汇称名单位和成分形成人的记忆的总体结构,同时也通过词汇意义与同一层面的其他联想成分以及构成个性词汇语义网络的成分彼此联系(Яценко 1999: 109)。

语义网络通过语言意义反映的民族文化体系产生,是每一种语言所固有的特点。尽管人类个体在语言能力和背景知识上都有区别,但语义网络的联想涵义组织的系统同构原则可以确保每一个使用者都可以自由运用语言符号。阿鲁玖诺娃曾经指出,意义理论(теория значения) 揭示语言如何构成,如何系统化,有哪些客体参数,用哪些手段描述物质和精神世界,如何对其作出评价;意义体系拥有每一个民族在认知、劳动、社会化和精神活动进程中业已形成的各种概念(Арутюнова 1982: 10 - 11)。

通常,在心理语言学和认知语言学中,经验格式塔会进入文本同构及联想涵义网络。经验格式塔是一种整体形象的动态心理构成,如俄语成语中暹罗双生子(Сиамс-

кие близнецы) 就是一个典型的格式塔结构形象,具有认知的知觉特点,是涵义构成的参与者,是被感知客体整体的隐性形象,蕴含广阔的信息空间,可以使我们清晰地认知所面对的客体。在认知语言学中,经验格式塔的结构化需要借助长时记忆的手段,在以往感知经验的基础上形成对事物、事件或现象的初始概括形象,即表征。(Бехтель 2005) 不同层面的抽象表征形成整体形象,可以进入所指意义的有几种表征,其联想关系构成认知客体的整体结构。

文本或语篇是一种言语思维的构成,是价值涵义统一体的独特构成,因此归入语言文化学范畴。在文本生成过程中,选择与文本相适应的合适的词汇单位就意味着其系统意义被激活,同时该文化内部的观念网络也被激活。对词汇单位的符号分析表明,各种不同的文本思想会产生不同的价值伴随意义,而词汇单位的语义深处的文化特点鲜明的理据义素得到延展。这种文化上有理据的称名单位是以整个历史发展进程中民族文化集体意识为大背景的,无论其有怎样的变体,在同一种词汇的最深处都是永久不变的常量结构。

对于俄罗斯民族而言,最具文化理据和典型性的词汇之一是“面包”(хлеб),它产生一系列具有派生联想形象的同构单位,如 хлеб всему голова, хлеб соль, хлебом не корми 等。在俄语语言世界图景中,观念“面包”体现深刻的民族自我意识,不仅是语言与文化的片段、历史与传统的融合,同时也是现实与神话相呼应的片段。

在词汇层面上,“面包”一词的语义结构中并没有评价的涵义特征,但作为观念词时却具有很广的评价涵义。前苏联电影《列宁在1918年》里一句经典的台词:“面包会有的,牛奶会有的,一切都会好起来的……”已远远超越了面包的基本内涵,也是“面包”一词成为了俄罗斯民族关键性观念词的典范示例。

面包作为人们日常生活的必需品,是富足安康的象征,其认知特点是生存的重要手段,是生活能量的来源。从符号角度看,观念词面包与人类对外部世界的感受相关,因此面包一词始终与社会文化变迁息息相关,其深层次的体现则蕴含在丰富的成语单位及文学文本中。沙洛夫在其作品《Хлеб на краю стола》中对切面包这一过程进行了十分细腻的描述: Он резал хлеб. При этом занятии у него было важное и напряжённое лицо, будто делил буханку на одинаковые пайки. 作家赋予这个动作以责任、诚实的内涵,当时的社会背景将面包这一观念上升到了民族个性的高度。因此,面包自然而然与生活中的传统、迷信等联系起来,从而也具有了神圣的空间特点。面包的神圣性体现在斯拉夫民族的很多礼仪上,如给新生儿的襁褓中放一块面包,婴儿就不会被独眼看坏,面包可以保护人们免受不和谐之力的伤害,等等。

文本涵义不断充实着俄罗斯文化的涵义空间或是在其背景下形成的联想场,这些涵义尤其显现在“面包”的语义结构以及同名观念的意义补充之中。间接派生称名具有鲜明的文本表达涵义,观念词“面包”深层次的潜意识表现多是通过一系列成语单位和文学文本实现的。Хлеб всему голова; Не будет хлеба, не будет обеда. 在俄罗斯民族的意识中,面包一定是自己的劳动所得,面包的原型观念来自《圣经》中对亚当和夏娃的训诫: Хлеб будете добывать в поте лица своего. Есть чужой хлеб, то осуждается обществом. 所以成语 На хлебах у кого; Хлебом не корми кого. 此外,用面包和盐款待贵宾已成俄罗斯文化的象征: водить хлеб-соль с кем, хлеб-соль ешь, а правду режь.

在失去系统意义时,对文本涵义的同构补偿意义尤为重要。一定的书面文本或是政论体文本内容形式的产生,在文化上更加具有理据性。Хлеба и зрелищ! 源于古罗马帝国奥古斯都当皇帝时平民向政府发出的呼吁,表示强烈要求两样东西:一是食物,二是娱乐消遣。还有一些固定搭配是间接与最初的文本联系的,需要进行深层次的文本符号分析,如成语 хлеб и масло вместо пушек, 是欧洲和平主义者的口号,与之相对立的是希特勒的军国主义口号 Пушка вместо масла. 须要指出,观念在文化中的体现一定与该文化主体的感受相关,与主体所处的社会文化变化有关。这些成语的出现恰恰是语言开放性、非线性自组织的鲜明写照,系统内部的观念是成语文本涵义构成的源泉,同时也显示出成语文本是人类意识、思维、社会、文化同构系统中的重要吸引,确保了语言进化的动态发展。

上述认知符号的分析表明,具有文化理据的称名单位,如“面包”在构成文本时完成以下几种功能:1) 在俄语词汇学中表达独一无二的词源意义;2) 以外部形式限定文本中与之相关的涵义;3) 每一个文本意义与俄语文化中的符号学体系相关,借助于民族语言意识的网状结构实现一定认知语用的效果。确切地说,由于历史的形成以及该文化社会赋予观念“面包”的联想关系,其中包括个性的联想关系,创造出该民族文化共同体成员所认同的形象涵义场。

现代语言学的研究对象不再局限于那些具有系统意义的单个语素,在相应完整的文本语义网络中形成的具有文化理据的同构现象越来越受到关注,而决定称名文化理据的主要因素则是言语交际主体的动机、取向以及作为交际中超语言因素的评价等。正是文本中的这些同构因素,使得客体在获得语言代码的同时,也获得了文化理据称名的常量定位。

3.2 文本的同构

文本的同构是文本内部各种因素的必然和动态的相

互作用,这种相互作用的过程就是能量的融合,而这种融合恰恰是文本空间中本体与功能的自组织,确定文本各成分内部的涵义分配。与此同时,文本涵义的生成能力通过各种“能量流”不断得到补充。所谓“能量流”,就是文本的联想派生实质,语言符号由于具备派生实质才成为文本的形象单位,它不仅承载了合理的信息,而且还表达了丰富的人类情感,关注的是人所感知和理解的世界。

文本充满认知与交际的同构,具有离散性、连续性和完整性等特点。文本不仅包括文本本身,还包括各种超语言因素,比如关于世界的知识、事件、对事件的看法及价值取向,等等。文本观念构成的可能性就是其自身属性:文本的构成产生了一定的涵义情境,包括关于言语思维主体的信息、客体及时空坐标等。文本的基本结构成分分是:1) 事件、参加者、行为信息;2) 非事件(包括伴随事件产生的情景、背景信息、事件的评价及与事件相关的文本信息)(Демьянков 1983: 203)。可以说,每一个文本背后都有一个特殊世界。斯捷潘诺夫认为,文本就是众多复杂结构中的可能世界之一(Алефиренко 2008: 194)。从结构上看,文本具有双重结构,即表达层面和内容层面(Сусов 1988: 8)。在文本的表达层面上,也即在能指之中,关键观念词汇凸现文本的民族意识,蕴含整个交际事件的涵义和情感评价能量。

正是观念词构成成语的涵义核心,其符号意义就是隐含的文本活动模式。语义和语用构成了文本内容层面,即所指。成语 гроздь гнева 由完全不相干的两个词汇单位同构。成语源自《圣经新约·启示录》第十四章第九节,“那天使就把镰刀扔到地上,收取了土地上的葡萄,丢在上帝愤怒的大酒瓮中……”“葡萄”一词在《圣经》中有着多层涵义,葡萄是主耶稣的子民,主是真葡萄树,跟随他的子民就是葡萄树上的枝条。此外,“葡萄”在圣经中是希望、丰腴的象征,是上帝赠予的福地迦南,是牛奶与蜜之地。以色列人在先知摩西率领下,冲破埃及法老的重重干扰,终于到达神赐的福地——迦南……后来随着事态的发展,上帝的许多愤怒都与葡萄联系在一起……希望的葡萄就成了愤怒的葡萄,内心不断积累的愤怒最终爆发,葡萄成为了战火的根源。

гроздь гнева 得以广泛运用,缘于一部同名小说。1939年美国作家斯坦贝克出版了他带来巨大声誉的同名小说《愤怒的葡萄》(Grapes of Wrath),这是一部饱含着愤怒的长篇小说。在整部小说中,愤怒的葡萄就是一个创造性吸引,是全文的主导涵义,成语意义的产生正是源于其文本结构组织的双重特点。通过对整个事件、参与者(以约德一家12口人为代表的佃农们被迫从俄克拉荷马逃亡希望之地加州)、历史背景(30年代大萧条时期的美国社会)的描述,对事件的评价(真实地反映了穷困农民的苦难,鞭挞了美国社会和经济的弊端)以及其他相关

信息对能指进行演绎和加工,所指中的形象凝结成为新的隐喻观念,一串葡萄(гроздь)与愤怒(гнев)藕合构成新的涵义,伴随着语言的创造性思维,产生了称名以及间接派生的称名符号。

特定文本空间中产生的语言符号就是语言与文化同构的结果。间接称名的任何一个符号,比如隐喻、转喻的搭配,成语和箴言等,都是在文本基础上产生的,其特点是形式与内容的不对称性,因为所指符号的涵义内容并非直接源于能指符号线性的和有组织的涵义。文本符号的不对称性是由其自身的属性决定的,是形象的语用手段和感觉、情感评价的口语化表达,也是对人物、对象、现象的鲜明的言语思维的需求。文本符号构成的认知实质首次由 Лацарус, Потебня 提出,其被视为基于新的内部形式的文本思维的“思维凝结”(сгущение мысли),统觉本身在符号形成中凝集了感觉形象,并用另一些表征来替换……(Потебня 1999: 194) 于是,原词的内部形式逐渐消失,伴随而来的则是新的涵义产生。

4 结束语

作为研究不同学科中存在的共同本质的交叉学科,同构理论开始广泛运用于语言文化学领域,同构的相互作用原理奠定了语言文化学后现代认知文本观念的基础。在与其他复杂体系动态过程整合的同时,同构的语言思维模式使得语言文化学研究从语言文化现象的静态转向进化的动态过程。运用同构中的耗散、分支、吸引等理论可以分析语言文化单位间接派生称名涵义的构成,进而揭示涵义空间自组织的进化机制,具体表现在以下 4 个方面: (1) 揭示文化事件相关性的隐含机制以及文化的言语行为和创造性思维产生的隐含机制; (2) 揭示言语思维变体中各种文化经验的作用,这些变体在一定观念域中具有稳定性和能产性的特点; (3) 揭示文化认知过程中条件性和开放性成分的相互关系,这一关系必定与特定价值涵义取向的民族文化空间选择机制密切相关; (4) 揭示民族文化意识结构整体进化的建构机制。

收稿日期: 2014-02-03

【责任编辑 李洪儒】

参考文献

- 斯坦贝克. 愤怒的葡萄 [Z]. 上海: 上海译文出版社, 2007.
- 隋然. 语言认知理论研究中的概念现象问题 [J]. 外语学刊, 2004(4).
- 伊普里戈·伊斯唐热. 从混沌到有序——人与自然的对话 [M]. 上海: 上海译文出版社, 2005.
- Алефиренко Н. Ф. Фразеология в свете современных лингвистических парадигм [M]. М.: ЭЛПИМ, 2008.
- Арутюнова Н. Д. Типы языковых значений. Оценка. Событие. Факт [M]. М.: Наука, 1988.
- Бондарко А. В. Опыт лингвистической интерпретации соотношения системы и среды [J]. Вопр. языкознания, 1985(1).
- Демьянков В. З. Событие в семантике, прагматике и в координатах интерпретации текста [J]. АН СССР. Сер. Лит. и яз., 1983(4).
- Караулов Ю. Н. Русский язык и языковая личность [M]. М.: Наука, 1987.
- Пищальникова В. А., Герман И. А. Введение в синергетику [M]. Барнаул: Наука, 1999.
- Потебня А. А. Мысль и язык [M]. Лабиринт: Наука, 1999.
- Сусов. И. П. Деятельность, сознание, дискурс и языковая система [A]. Языковое общение: Процессы и единицы [С]. Калинин: Наука, 1988.
- Флоренский П. Столп и утверждение истины. Т. 2 [M]. М.: Наука, 1990.
- Хакен Г. Синергетика [M]. М.: Мир, 1980.
- Яценко Е. Ю. Культурологические механизмы адаптации концепта к лексической системе языка [Z]. Реальность, язык и сознание: Межвуз. сб. науч. тр. Тамбов, 1999.